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构成原因探析 ——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

孟颖颖^{a,b}

(武汉大学 a.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b.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摘要: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结果,本文发现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从两个维度分析了形成这些排斥的原因:一是受人力资本素质、文化与社会认同等自身禀赋约束的功能性排斥,二是受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影响的结构性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与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受阻,只有拆除这种藩篱才能够促进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排斥;城市融合;功能性;结构性

中图分类号:C924.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11)03-0011-06 收稿日期:2010-12-10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09JZD0027)和第四十七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孟颖颖,女,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保障与公共管理。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的一个社会学术语,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é Lenior)首次使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说明被排斥在正式就业岗位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被排斥”状态^①。之后,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开始认可并使用这一概念。对社会排斥的涵义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儒姆认为,社会排斥意味着“他们正遭受着多方面的窘迫境遇,忍受着他们居住社区物质和文化环境持续的、不断加强的恶化”,并且“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出现了相当程度上的不可逆转的分裂。”^②约翰·皮尔森认为:“社会排斥是对个人和家庭、群体和社区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要资源的全面剥夺过程”^③。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社会排斥是指由于多重的和变化的因素导致人民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正常交流、实践和权利之外。贫困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因素之一,社会排斥也指不能享受住房、教育、健康和服务的充分权利。”^④从学者们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排斥共同的核心内涵,即由于各种原因,

可以是自身的,也可以是社会结构原因所导致的社会成员不能共同分享社会资源以及公民权利的窘迫处境。这种排斥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服务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等。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目前在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本文所讨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面临的“社会排斥”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城市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从而导致其不能获取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的过程及状态。也即本文所分析的社会排斥的内容并不局限

①René Lenior.Les Exclus,1974,UN Francais sur dix. 2nd ed. Paris,Seuil. 1989. Quoted in 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Vo1.133;531-578.

②Graham Room,1999,Social Exclusion,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1.8,No.3,166-170.

③John Pierson,1999,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New York:Routledge,No. 3:2001.4-7.

④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0, Background Report:Social Exclusion-Poverty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Buckingham;Philadelphia: Open University Press,3-12.

于经济资源或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还体现在能力、社会参与及实现程度上的排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同于父辈传统农民工的特质,不同于城市同龄人的身份,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考察其从生存状况到权利获得、社会认同等各方面的问题。文本结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于2007年6-8月在全国十省份开展的农民工生存状况问卷调查结果,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融合困难及成因。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694份,有效问卷3255份,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1211份。

一、社会排斥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现实表现 (一)经济排斥

我们从就业——收入——消费三个环节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经济排斥。从就业环节来看,就业作为劳动力获取维持其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同样重要。但是,传统二元经济模式派生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①所具有的二级结构特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显然存在多种局限。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就业具有工资水平较高、就业稳定、工作环境安全、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就业的工资水平较低、就业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虽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提高,但是与城市里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相比,其知识贮备、劳动技能显然制约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社会资本的缺乏也使得他们很难进入正规就业部门,在就业环节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从收入与消费环节来看,主要集中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事实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十省市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仅为749元。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对于勤俭、质朴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具有传统农民身上勤劳、质朴的可贵品质,他们穿着时髦、讲究消费品味,追求和城里同龄人一样的物质生活。有限的就业机会、微薄的收入与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严重的经济窘境。

(二)政治排斥

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排斥。和第一

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经成为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其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往往被当做“外来人口”对待;他们流动频繁的特点,也往往造成家乡地方政府与所在务工城市政府对其政治参与管理的“疏忽”,其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往往成为“真空地带”,政治参与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市民,更没有机会对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表达意见。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年龄结构较轻,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普遍不重视政治权利的实现,大多对自己所享有的政治权力范围毫不知晓。表现最为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在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到城市务工,往往既没有参加家乡基层组织的代表选举,也未能参与所在城市的代表选举,调查对象中有67.63%的人近五年内未参加过任何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政治排斥意味着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没有或者缺乏代表自身集团利益的发言权。基本政治权益诉求的正当渠道的缺失,对于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

(三)文化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排斥集中体现为农民工群体的城市“亚文化”的形成。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由各种社会和自然因素如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或地区文化。这种与主文化相对应的、局部的亚文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极易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传统农民的乡土特质正在逐步褪去,但是与城市同龄人相比,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等都导致了“亚文化”的形成,成为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很难逾越的无形隔阂。“文化堕距”^②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有着和城市同龄人相差无几的打扮装束,但其文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随之发生本质性的转变,其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仍带有很大的

①这里所说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是指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衍生制度将城乡劳动力市场人为分割成的一级劳动力市场与次级劳动力市场,不同于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发展经济学中所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主要是根据个人能力、人力资本素质、劳动技能等自身禀赋原因所致的等级差别产生的劳动力市场的自然分类。

②“文化堕距”的概念由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提出,意指文化模式上的更替要比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都要慢。

“乡土特质”,而这往往成为城市市民对其产生偏见的根源。虽然相对于父辈来说,与城市市民的交往、互动频率都有着明显的提高,但由“亚文化”引起的根本冲突以及诱发的城市市民对自己的偏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同样面临城市社会网络分割、社会支持减弱、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主流群体之外的困境。

(四)教育排斥

受教育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权利的不充分实现却成为其城市融合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又一障碍。就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融入中的教育排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缺失。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有86.1%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方面的正规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如果能够合理地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必将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提供较目前更多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虽然,国家也正在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比如为落实《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教育部、科技部和建设部六部委曾于2004年4月共同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但就我们在各地的调研情况来看,此项工程由于财政补助力度过小地方政府热情度不够(每人每期培训费用财政补助为100元)、培训课程实用针对性不强、不能与安置就业相挂钩、课程周期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而实施情况欠佳。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缺失。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结构整体较轻,但受农村早婚、早育风俗影响,普遍婚育年龄较早。据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在总体1211个样本中,有接近1/2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为人父母。对于已婚育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城市生活融入中,除了要赚取养家钱之外,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虽然,目前各地已经陆续解除了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就读的限制政策,但由于城市较高的教育成本,即使学校不收取高昂的赞助费、借读费,相对农村基础教育较高的一般教育支出、以及农民工流动频繁等原因也都导致真正入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并不多。而收费相对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却往往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教育水平有限,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学期中

途教育中断,不能正常连续就读等问题。受教育权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教育歧视成为阻碍其向上流动的障碍因素之一。

(五)福利排斥

同父辈们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却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的公共福利。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福利排斥主要体现在以社会保障权益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权利的缺失上。当前存在的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城乡差别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得绝大多数非正规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们都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享受不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待遇。

近些年来,中央及各级政府已经逐步开始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有关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提高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的政策也陆续出台,但是,由于涉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一般都只是在部分省市推行,统筹层次过低,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再加上出于减少用工成本的考虑,在监督不利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极易逃避缴费责任,不为农民工办理入保手续,农民工的实际参保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211名调查对象中,只有21%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10.3%参加了医疗保险,什么保险项目都没有参加的将近总体的2/3。融入城市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平等地享受到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在社会风险无处不在的城市社会里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

二、功能性排斥:禀赋条件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生根本性障碍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多重边缘化”的境地,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不可逾越的藩篱。在社会排斥理论中,对社会排斥的划分类型有多种方法,根据社会排斥成因的构成,可以将其分为功能性排斥和结构性排斥。本文将依照这种划分方法,从功能性排斥与结构性排斥两个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的形成原因。

(一)人力资本素质不足:功能性排斥的内生根本性约束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①,功能性社会排斥是指被排斥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因为自身功能上的欠缺而处

^①Hilary Silver,1994,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vol.133:5-6.

于的一种被排斥状态,这种排斥不是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客观的、固有的、不易改变的结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被排斥群体(组织)或个体自身的原因所形成的社会排斥。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以自身人力资本素质不足为主要特征的禀赋条件约束是形成其功能性社会排斥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生代劳动大军,不同于有丰富务农经验的传统农民工,他们大多走出校门便直接步入社会,简单的社会阅历往往制约其在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社会资本也限制了其融合速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除了相对匮乏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之外,决定其城市融合进度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虽然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结构较轻、健康状况良好、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人力资本特质,但不能否认的是,相对于城市里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同龄人来说,这一群体仍存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普遍特征。

表1中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融合程度的自我认知^①为因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务工时间等可能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不满足一般多元回归分析对因变量具有间距测度等级的连续变量的要求,因此,我们采用 Multinomial Logistic 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掌握劳动技能情况、务工时间(代表工作经验)、婚姻状况四个人力资本特征变量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正相关作用。以文化程度为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对其城市融合程度进行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01$),肯德尔系数为正(Kendall's tau-b=0.024),说明两者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表1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程度的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	相关程度(P)	肯德尔系数(K)	相关方向
收入水平(missing=0)	0.020*	0.016	+
性别(missing=0)	0.181	-0.051	—
年龄(missing=0)	0.243	0.043	—
婚姻状况(missing=2)	0.037*	0.025	+
文化程度(missing=0)	0.001*	0.024	+
方言掌握情况(missing=0)	0.231	0.028	—
掌握劳动技能(missing=0)	0.002*	0.015	+
务工时间(missing=1)	0.019*	0.007	+

此外,结果显示,直接受制于人力资本素质的收入水平也与融合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认为,在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各种因素中,人力资本的匮乏才是最根本的障碍因素。在进城初期,人力资本的匮乏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工作的领域一般只能局限于次级劳动力市场,进而也决定了其工资收入的微薄。之后,所拥有的较少的经济资本又直接限制了其通过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从而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社会地位的可能。进一步来看,较低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又间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狭隘的个人交往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这种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必然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市民的社会圈。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制约其他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也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源所在。以上分析也解释了调研中常常遇到的两个几乎拥有同样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村青年(同胞兄弟、姐妹)进入城市务工后,有的迅速适应、融入城市生活,而有的却迟迟融入不了的现象。事实上,从我们调研过程中接触到的对象来看,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实现似乎更多地发生在某一类型的特定人群之中,一般而言,这类人群在知识储备、劳动技能、价值观念、乃至性格志向上都表现出较强的融合意愿倾向。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在经济地位与职业地位提高的情况下,率先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新市民。而新生代农民工正具备了以上条件,或者说年纪轻、有求知欲、有干劲的他们更容易达到融合所需的人力资本要求,更容易实现融合。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是消解新生代农民工所遭遇的功能性排斥的根本所在,也是在其城市融合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内生原因。

(二)文化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功能性排斥的隐性意识形态约束

除人力资本素质不足之外,造成功能性排斥的原因还有来自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心理因素。由人力资本素质不足所间接引致的社会认同感的普遍缺失以及消极的自我认同也成为阻碍其融入城市生活

^①由于融合程度是一个相对主观的价值判断,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可能对这一指标衡量的困难,因此,我们通过被调查者的自我评价来反映其对自身城市融合程度的判定。该指标设计的问题是“您认为您目前的城市融合达到了什么程度?”答案采用10等级李克特量表表示,其中1表示完全没有融合,10表示融合的非常好,数值越大表示农民工自我感知的融合程度越高。

的隐性意识形态约束。

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后,不仅要在语言、行为方式、生活习惯、居住环境上适应新的工作、生活场域,还要从心理、价值观念等方面适应新的环境。来自方方面面的社会排斥,迫使他们常常通过个人经验的社会实践和主观意识的反思来认识并理解自我,非预期的现实否定着他们的心理预期,影响着他们的自我认同。在城市务工生活过程中,和其他流动人口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主动选择自我身份的途径,只能被动地接受并认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所强加给他们的制度性身份。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有超过2/3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已经不是农民,将近1/5的人认为自己已经接近市民身份,这两个比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的约1/3和1/10。显然,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减弱对城乡户籍制度所赋予其的制度性身份的认同,趋向于自我以及社会对其身份的新的认同。

但是,现实生活中社会认同感的缺失及其群体自身局限性所导致的内群体偏向、外群体敌视的意识仍然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的真正融入产生着消极的影响。社会认同所反映出的社会成员所共同拥有的信仰、价值和行动取向的集中体现本质上属于一种集体观念。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在其为城市贡献青春、贡献力量的同时,看到的、听到的却多是新闻媒介对本群体带有歧视色彩的报道,感受到的多是城市市民对自己带有排斥心理的言语及态度。这种“城里人”对待“外来者”的特有的排斥方式,使得心理本就脆弱的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意愿,但也只能以“过客”身份自居,找不到属于“自我”的归属感。非“城市人”的先赋身份,自我归属感与社会认同感的缺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市民交往的机会,偏向于内群体交往,更进一步阻碍了其融入城市生活。

三、结构性排斥:制度环境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外生性障碍

结构性社会排斥是指由于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而形成的社会排斥,通常包括通过制度确定下来的社会等级结构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社会分层。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格局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这场社会资源重新分配与利益格局重新调整的过程中形成。作为新的边缘化群体的代表,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社会排斥的原因,除了禀赋条件约束下的

内生性障碍因素外,政策、来自制度的外生性约束也是不可否认的重要成因。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所实行的城乡有别的户籍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二元社会保障体系等都显露出政府对待城市与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政策差异,这些带有明显“二元”色彩的制度体系也正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外生性制度障碍的原因所在。需要强调的一点是,造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困难的外生性制度障碍因素有很多,比如城乡有别或者是地区有别的财政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这些制度也都可能促成结构性排斥的形成,受篇幅所限,这里仅选择户籍、就业、社会保障三种代表性制度进行分析。

(一)户籍制度:结构性排斥的元制度

在社会学意义上,户籍制度被界定为“一种以家庭出身和地域来确定个人社会身份的名称符号”,在现实社会中,户籍的表现形式或操作方式就是个人的户口,具体来讲,包括两个基本属性:户口类别、籍地^①。在中国,由于现行户籍制度能够提供与户籍身份相关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及公共福利等多种“关联资源”,因而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形成中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其他城乡二元分割政策的“源头”。本文认为,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各种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制度,以及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各种显性或隐性的社会福利是造成农民工遭遇结构性社会排斥的最根本源头,这里将其列为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元制度。

从身份获取来看,由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的身份定义一直是模糊的。拥有农村户籍,但在城市务工、生活的非农非工的特殊身份,使得人们无法将其纳入惯常社会场域中的任何一类群体,只能将其定位于特殊的“边缘群体”。以僵硬的户籍制度为基础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将城市劳动力市场人为地分割为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户籍身份的限制使得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寻求就业机会,从事着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险”工种。同时,也享受不到应有的劳动保护与劳动者权益,一旦发生劳动纠纷他们往往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与户籍制度相关联的各种社会福利对于他们更是无从谈起。

(二)就业制度:结构性排斥的衍生制度

^①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印书馆,2003:54-55。

如果说户籍身份的差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结构性排斥,那么,由二元户籍制度次生出的二元就业制度则成为形成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排斥的衍生制度。

在现代化工业社会中,就业权利是劳动者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其作为实现劳动者基本生存权与基本发展权的最主要途径,决定并影响着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状况与质量。和父辈们一样,新生代农民工从就业的准入环节就必须面对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现实,由于户籍上的天然差别,他们往往通过各种非正规渠道被个体、私营企业等非正规用人单位吸纳,在那里,他们从事着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脏、累、险”工作,绝大多数都未与用人单位建立起正规的劳动关系。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拥有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的知识储备,更高的劳动技能,更快的适应与领悟能力,但是,僵化的劳动力市场使得他们仍然只能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

此外,除了就业准入环节的歧视外,在整个劳动服务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也由于缺乏与城市劳动力同等的就业权益保障,面临着各种社会化风险,更谈不上享受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的权利。同时,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也都无法获得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服务机构提供的职业指导及就业培训等公共服务。

(三) 社会保障制度:结构性排斥的强化制度

如果说现行户籍制度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就业制度是构成新生代农民工结构性排斥,从而导致其城市融合困难的制度障碍因素的话,那么,现行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则起到了固化甚至是强化这种结构性排斥的作用。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依法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其目的在于不断地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近些年来,在全国农村推行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以及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保障项目对保障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起到了不可否认的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农民工而言,边缘人身份使他们既无法享受城市居民享有的一切社会保障,又往往因为频繁的流动无法顺利实现作为农村居民应有的社会保障权益。而且,相对于传统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像传统农民工那样只拥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劳动经

验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模式,也不再像他们的父辈们那样用一种潜意识的“农村人”的主观认知指导并规范自己在城市的务工行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城市生活体验往往导致他们对未来生活有着更高的心理预期,但是,现实中与城市同龄人差别巨大的生活境遇极易造成他们强烈的“被剥夺感”,进而诱发他们抵制性的心理及行为。

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逐渐剥离户籍制度与城乡居民财富、公共福利之间的联系,并且逐渐以公平、公正的准则规范就业制度的话,那么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由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形成的结构性排斥起到了有力的固化作用。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困难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常常被排斥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极易受到各种市场化风险的冲击,陷入生存困境。

四、结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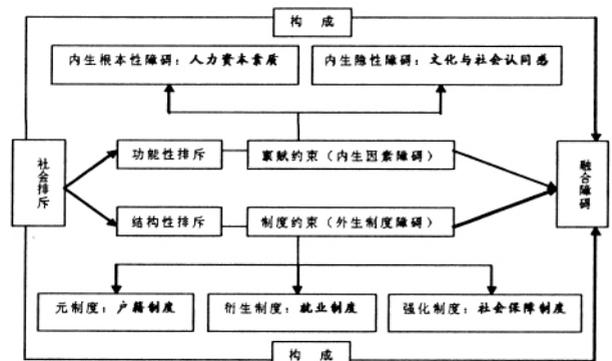


图1 新生代农民工融合障碍原因构成图

图1总结了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构成原因的分析逻辑:现实中存在的各种类型的社会排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困难,我们以社会学的视角将这些排斥分为两种类型:由禀赋约束构成的功能性排斥和由制度约束构成的结构性排斥,人力资本素质不高、文化与社会认同缺失以及带有城乡二元分割色彩的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共同构成了两种社会排斥存在的原因。

理论上的分析和实地调研的结果都告诉我们: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弱势群体,进而被边缘化的事实是由于各项社会排斥存在所导致的结果,而这些社会排斥也正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生活的主要障碍因素。实现包括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城市融合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对当代中国提出的要求与任务,我们只有尽快扫清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障碍,才能加快推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加快推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下转 22 页)

参考文献:

- [1]蔡昉.劳动力流动对市场发育、经济增长的影响[J].人口世界,2000(6):1-5.
- [2]蔡昉.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43-49.
- [3]李培林.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的经济社会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9-281.
- [4]王春光.新生代的农村流动人口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求[J].民主与科学,2000(1):18-20.
- [5]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入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63-67.
- [6]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M].商务印书馆,2003:54-55.
- [7]Zhao,Yaohui,2002,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30:321-334.

- [8]René Lenior. *Les Exclus*,1974,UN Francais sur dix.2nd ed.Paris,Seuil. 1989. Quoted in Hilary Silver. "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Three paradigms".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Vol.133:531-578.
- [9]Graham Room,1999,Social Exclusion,Solidarity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Welfare*,Vol.8,No.3:166-170.
- [10]John Pierson,1999,Tackling Social Exclusion:4-7.
- [11]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0,Background Report:Social Exclusion-Poverty and Other Social Problem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3-12.
- [12]Hilary Silver,1994,Social exclusion and social solidarity: three paradigms,*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vol.133:5-6.

Analysis on the Barriers to Urban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lusion Perspective

MENG Ying-y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Wuhan 400072)

Abstract:Combination of field research and interviews,the article find that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facing many aspects of the exclusion from the economic,political,cultural,education and welfare.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al exclusion,the article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these exclusion formations: Firstly,the function exclusion of its endowment by the quality of human capital,cultural and social identity,and secondly,the structural exclusion by residence,employment,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e existence of the functional and structural social exclusion is a direct reason of blocking the urban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only to remove such barriers as soon as possible to promote their urban integration.

Key words:New generation of workers;social exclusion;urban integration;functionality;structure